

丁景唐 陈长歌

# 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纪念殷夫烈士牺牲五十周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纪念殷夫烈士牺牲五十周年

丁景唐 陈长歌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杭州

责任编辑 铁 流

封面设计 徐景祥

**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丁景唐 陈长歌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875 插页1 字数95,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

统一书号：10103·220 定 价：0.33 元



殷夫烈士

张怀江刻

## 目 次

- |     |                  |
|-----|------------------|
| 1   | 关于殷夫的生平          |
| 23  | 殷夫的诗             |
| 25  | 《孩儿塔》            |
| 42  | 《在死神未到之前》        |
| 46  | 红色鼓动诗            |
| 59  | 殷夫的小说、散文作品       |
| 71  | 殷夫与《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 |
| 72  | 殷夫与《列宁青年》        |
| 89  | 殷夫与《摩登青年》        |
| 97  | 殷夫与裴多菲           |
|     | 【附录】             |
| 108 | 殷夫著译系年目录         |
| 124 | 殷夫著作书目           |
| 142 | 殷夫的笔名            |
| 147 | 后记               |
| 150 | 编校续记             |

## 关于殷夫的生平

我的诗和虹彩一样，  
从海起入天中，  
直贯着沙漠的宇宙，  
吹嘘着地球的长孔。

殷夫：《我醒时……》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这是一九三一年春天，鲁迅先生为沉痛悼念左联五烈士，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写下的名言。左联五烈士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用鲜血和生命为革命文学奠基，今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先烈的事业，将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厦建设得更加雄伟辉煌。

研究殷夫烈士的生平和作品是对先烈遗产的继承，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空白”论的批判。林彪、“四人帮”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根本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和文化运动的高度评价，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成就，也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光辉战绩。他们把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视作建国以来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黑线”的“黑根”和“来源”。他们集中中外反革命的法西斯暴行，干尽了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未能干的罪恶勾当，残酷诬陷、迫害、虐杀无数活着的文艺工作者，也对三十年代已经为革命献出生命的革命作家大肆鞭尸、挞伐、诬蔑。这是林彪、“四人帮”滔天罪行的一个方面。在春暖花开的长征路上，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继承三十年代革命文艺，包括左联五烈士的作品的战斗传统，深入地批判林彪、“四人帮”妄想斩绝这个革命文艺传统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

一九八一年，是左联五烈士牺牲的五十周年，殷夫是其中最年青的一个，牺牲时才二十二岁。他是左联时期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之一。殷夫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壮丽的革命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品德，他在革命实践中经受严峻考验、不断磨炼成长的自我改造的经历，他以文艺为革命服务的战斗经验，以及他在文艺上的创造性劳动，都值得我们深切纪念、认真学习。

殷夫烈士和许多爱好文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从一九二八年秋被捕出狱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后，就以主要精力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而以一部分时间进行文学活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几位重要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李伟森）、何孟雄和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或活埋于上海市郊龙华旷场。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立即用中、英、日几国文字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界发布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书。左联专门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另一位早一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宗辉烈士的肖像、传略和有关的作品等。鲁迅怀着对烈士的极大的悲痛，对敌人的极大的愤恨，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先生和阿英同志还分别写了《柔石小传》和《殷夫小传》。两年以后，鲁迅又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再隔三年，鲁迅特为殷夫的诗集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鲁迅先生和阿英同志为我们留下了殷夫烈士的生平简史。但是，由于当年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处于地下秘密工作的条件，鲁迅和阿英不可能进行各方面的调查研究，而为了革命的利益，更不允许将烈士的秘密革命活动公开见诸文字，加以国民党反动派毁灭革命文物，使我们在一个较长的



时间内，对这位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党的重要干部，只知道他以殷夫、白莽的笔名写诗而著闻于世，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和生平、革命史迹则有许多泯没了，所知甚少。这就增加了我们对于殷夫作品的理解和研究的困难，由此对殷夫的有些诗作，还产生一些误解。只有当我们较多地掌握史料，对革命家殷夫的生平有了较多了解以后，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切理解殷夫的作品。

建国以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曾发掘整理出一些新的资料。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也蒙受其害，过去收集到的资料也被毁弃无遗。现在重新收集整理，对殷夫烈士的生平事迹作一综述，并校正过去流传资料中的笔误、印误。

殷夫烈士以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东乡大徐村一个中产农家（阿英《殷夫小传》）。父亲是个医生。殷夫本姓徐，原名柏庭，幼年在乡间读私塾。九岁时就能看各种小说，后来家庭定居象山县城——丹城。一九二一年，殷夫十二岁，在象山县城县立高等小学（现为浙江省象山中学）读书，学名徐祖华<sup>①</sup>。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殷夫有一个慈爱的母亲。后来她觉察到殷夫参加了革命工作，虽然为他担心，但并未阻拦他，只是嘱咐他：“一切你自己小心”。我们从殷夫献给母亲的两首诗：《东方的玛丽亚——献母亲》、《给母亲》及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

---

<sup>①</sup>丁景唐：《〈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补正》（《学术月刊》1964年第五期）中引用1921年3月编印的《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同学录》。

到之前》中，可以看到他对母亲深厚的感情。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徐培根曾留学德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当过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航空署长等要职。徐培根尽力想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殷夫。但是殷夫却截然相反，坚决割断他哥哥的羁绊，勇往直前，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坚决宣布与哥哥决裂。殷夫的二哥早死，三哥在上海一家纸厂做事，两个姐姐都家居象山。据阿英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写的《重读殷夫遗稿〈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一文中说，殷夫还有一个妹妹，是个革命的同情者，曾给殷夫以支援。殷夫的诗《妹妹的蛋儿》就是反映他在妹妹的帮助下，逃离家庭的软禁的。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证实殷夫并没有妹妹；这首诗里的所谓“妹妹”，可能是他的另一个亲属或女友。

殷夫十五、六岁在象山时已开始写诗。现在留下的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就是一九二四——二五年留下的残诗。这组小诗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一九二六年十七岁时，殷夫来到上海进入民立中学，后转浦东中学，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毙。由那当参谋处长的大哥保释出来。这次入狱对他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与锻炼。殷夫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在狱中写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和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写的《监房的一夜》，以及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一日写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

信》<sup>①</sup>，都为我们研究殷夫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可以由此看到一九二七年春，他在浦东中学参加革命活动时，他的大哥徐培根，正驻扎在上海市郊。有一次，在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里，徐培根对他说：“你这小孩子，快不要再胡闹，好好地读书吧！”并且又低声地说：“我告诉你，将来时局一下变了，你是一定会吃苦的。”

殷夫反问：“时局要变，你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参谋处长脱口而出，给蒋介石正在策划勾结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绞死革命的阴谋露了风。殷夫还想问下去，这时，一个著名的刽子手，姓杨的特务处长进来了。徐培根就站起来说：“回学校去吧？知道了吗？多用用脑子，多看看世面！”

在没有尖锐复杂斗争经验的少年殷夫头脑中，“前进还是后退”的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激烈地交战着。如殷夫所自我解剖的一样：“我旧的阶级根性，完全支配了我，把我整个的思维，感觉系统都搅得象瀑下的溪流似的紊乱，纠缠，莫衷一是。”（《写给一个哥哥的信》）他是多么焦急地盼望上级领导来指明前进的方向。

直到三天之后，C同志会见了殷夫，才“搭救了”他，嘱他立即再到徐培根那边去探听详细情况。可是当殷夫赶去

---

<sup>①</sup>《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与组诗《血字》七首，一同发表于1930年5月10日《海燕》（即《拓荒者》）第4、5期合刊，署名Ivan。后由阿英同志用张若英笔名，把《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编入《现代文学读本》第一册，1930年7月现代书局出版，署名改为伊凡，文中“D大学”也被改为“大学”。建国后出版的四种殷夫选集都未收入这篇重要的作品。

时，蒋介石总司令部已于前一夜五点钟全部离开上海。过了一夜，“上海便布满了白色的迷雾”，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阴谋毕露，扼杀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上海！才走上革命征途的少年殷夫也在这次血雨腥风的政变中被捕入狱。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详细地叙述了那个国民党员的告密，敌人的搜查，押送到牢狱种种经过，和诗人思潮的起伏。散文《监房的一夜》也反映了他在牢监中的一些情况。

少年殷夫在狱中表现是英勇的，如他《在死神未到之前》一诗的基调所宣示的，充满了为革命而献身的坚定决心。亲身经历了这一场血与铁的严酷考验、锻炼，少年殷夫思想上迅速成长起来。入狱前C同志对他的一次严肃谈话，要他利用徐培根的特殊关系，去探听敌人的阴谋真相。如今，他在牢狱中经过严酷考验，也懂得了应当利用徐培根的特殊关系，争取出狱，为革命保存力量，继续作战的策略。殷夫在《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自叙道：“我还得活哟，我为什么应该乱丢我的生命，我不要做英雄，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可支配的。”他是从个人是革命组织一员的高度，来正确对待个人生死问题。他已将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他的生命是属于整个革命事业的，不能由个人来任意支配的。他买通了一个士兵，设法给徐培根寄信，由徐培根保释出狱。

殷夫在《别了，哥哥》(诗)和《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散文)中都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这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宣告思想上、政治上的彻底决裂。他利用徐培根这个社会关系是革命需要的一种策略。殷夫第一次由徐培根保释出狱以

后，徐培根把他软禁在“脚下”，要他预备功课。殷夫在《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里说：“但你却没知道我在预备些什么功课呢。”实际上依我们领会，是仍在学习社会科学、革命文艺书刊，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经过“软禁”了一段时间后，在徐培根要出国的时候，将他送入D大学。徐培根是企图用大学的贵族生涯消磨殷夫的革命意志，“做剥削阶级的工具”，“将来参加这个剥削机械的一部门”。而殷夫却坚决同他决裂，继续向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交战到底，直到献出了生命。

这D大学就是在上海吴淞海滨的同济大学，是德国帝国主义所办，以培养为德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徐培根将倔强的弟弟交付给它，以便严加管束。只是结果象他们对其中的绝大部分的人才都不能控制一样，也无法使殷夫驯服。

一九二七年秋，殷夫通过女友“真”，借用上虞徐文雄的文凭进入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根据一九二八年九月《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二九六页上的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学生名单，殷夫当时学名徐文雄，号之白，年十九岁，籍贯浙江上虞，通讯处象山城隍庙隔壁徐第。这“徐第”就是他大嫂的住处，殷夫在上海读书时暑假回家即住在那里。但上虞却不是殷夫的原籍而是徐文雄本人的籍贯。由于《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的发现，解决了阿英同志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写的《殷夫小传》中那个错印了的“文雄白”笔名的问题。原来殷夫在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读书时用了徐文雄的名字，而“文

雄白”实为“徐文雄”和“徐白”两个名字的错印<sup>①</sup>。

和殷夫烈士有着深厚友谊的阿英同志在《鲁迅忌日忆殷夫》（刊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北京日报》，后收入《左

---

①回想六十年代初当我们考证出“文雄白”是“徐文雄”和“徐白”两个名字错印的几乎同一时候，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同志也因在创造社刊物《文化批判》上看到一封署名“徐文雄于同济”的读者来信《被奥伏赫变的话》，从各方面作了分析、考证，并请教阿英同志，也得出了徐文雄是殷夫在同济大学读书时的名字的结论。\*

这篇署名“徐文雄于同济”的读者来信没有写作年月。但从《文化批判》创刊于1928年1月中旬，第三期在三月中旬出版，这封读者来信中又提到二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九期上成仿吾的文章，则此信当写于二月间。信中提到“我是一个刚学了半年德文的学生”，和前边提到的同济大学纪念册所列相符，可作殷夫1927年秋进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一年级读书的又一佐证。殷夫这封被《文化批判》编者加上《被奥伏赫变的话》标题的读者来信，刊登在《文化批判》第三期上。他在对比了《文化批判》一月号上彭康同志《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的译文，又引证《创造月刊》第九期上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的有关几句话，对彭康的译文提出商榷的意见。讨论中谈到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原文中两句著名的话：“批判不仅是解剖刀，乃是一种武器”和“不把普罗列塔利亚特‘奥伏赫变’，哲学决不能实现”。（根据我们查对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5页、467页，这二句译作：“〔批判〕，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和“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殷夫这封信，说明他在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虽只学习了半年时间，但凭着刻苦努力，认真学习已能校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译文；殷夫在同济读书时，经常留心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和《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

\* 孙玉石（笔名一石）：《关于殷夫笔名的一点辨证——读书札记》，刊1963年11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中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据他的回忆,殷夫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不几天,就投寄一束诗稿给《太阳月刊》编辑部。阿英同志回忆说:“我立刻被这些诗篇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情不自禁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第四期上的长诗《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阿英同志文章中回忆署名殷夫,记忆有误)。

在约定的日子,殷夫从吴淞来到上海市内约定的地点。他是那样年青,如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记的一样,“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中等身材,留着短发。从阿英同志的回忆文章中,知道学校的环境对殷夫不利,但他还想坚持着学好德文。他哥哥怕他革命,总想把他带在身边。阿英和殷夫交谈了诗、写作生活和当时的文学活动。殷夫说话很沉静,声音相当低,象在秘密会场里一样。句子很短,很明快,也很诚恳,完全显示出革命者的朴素风格。从这以后,殷夫成了太阳社社员,经常为太阳社刊物写稿。当时著名左翼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蒋光慈也很看重殷夫的诗。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即殷夫牺牲后半年,当蒋光慈贫病交迫,寂寞地逝世的前夕,还对人谈到他对殷夫的深情怀念。

感谢鲁迅先生为我们保存了殷夫自编的《孩儿塔》诗稿,使我们能从诗后所署年月、地点,发现一些史料的线索。譬如:

(一) 殷夫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坐牢三个月，经他大哥保释出狱，受到大哥的软禁。在进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读书之前，有可能回过象山家乡一次。否则很难解说现在的《殷夫选集》中留存有一首写于“1927，象山”的《呵，我爱的》诗。

(二) 殷夫在进入同济读书后，一时未能联系上第一次被捕后失却了联系的组织关系，在一些诗中表现了一种苦闷的情绪、焦急的期待。后来，如象那首深藏着革命激情的抒情诗篇《我们初次相见》所显露的，殷夫以“你是一个英勇的灵魂，奋斗的情绪刻在你的眉心”来称颂那位“我自此在心中留下你的人格”的战友。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位战友就是前来恢复殷夫组织关系的革命组织的代表。由此，我们认为殷夫在第一次出狱以后，到一九二七年秋重来上海，进入吴淞海滨的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一年级读书；经过一个时期的焦急而痛苦的期待，而后才又与革命组织接上关系，继续投入了革命工作。殷夫进同济以后，由于生活面扩大，经历曲折复杂，如殷夫自己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所自我剖析的，“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反映在他这一时候的诗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其中有一部分诗已经从小资产阶级的抒情转向反映革命生活和抒发革命的激情，而另一些却留着旧日的痕迹。

一九二八年，殷夫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的时间，从一九二八年殷夫所写几首诗末写着“一九二八年于西寺”和“一九二八年于象山”、“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一九二八年十



一月于西寺”，可证明殷夫的第二次入狱，是在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读书的时候，时间约在秋季，原因不详。不久被他大嫂托人保释出来，又受到了大哥的“干涉”，把他软禁在象山县城（丹城）大嫂家中。殷夫蛰居家乡时，有时到丹城北门外的西寺一带沉思漫步。阿英同志在《重读殷夫遗稿〈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中，为殷夫第二次被捕，经大哥（按：大哥当时在德国，应是大嫂）保释出狱，软禁在家乡一事，提供了确证。他说：“我记得，殷夫曾经告诉过我，他一次被哥哥从监里保出后，就被关在家里，靠妹妹的秘密帮助，才和外面取得了联系，并挣脱出来”。这个时期的一些诗，反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战士，在失去党的联系时的苦闷情绪和矛盾交织的思想，但又期待重新走上革命征途，投入新的战斗。《归来》、《给母亲》《我醒时……》，最能表达诗人这种追怀“尽日是工作与兴奋，每夜是红花的梦影！”的心情。“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在诗中反映得更为强烈。

一九二八年底，殷夫在所谓的妹妹的帮助下潜离家乡，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浪生活，终于同党的地下组织重又接上关系，从此专门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以前，许多有关评介殷夫的文章（包括我们在内），都认为殷夫是在一九二九年春重来上海的。但自从我们发现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创造社刊物《文艺生活》（周刊）第二号有殷夫的《伏尔加的急流》以后，认为殷夫重返上海的时间似应以一九二八年底为是。这次重返上海，